

和平学视域下的赛珍珠反战作品《龙子》

王艺萱^{1,*}, 李丽娟¹, 郭逸歆¹

(1.南京理工大学; * WangYixuan@njjust.edu.cn)

摘 要: 长篇小说《龙子》是美国作家赛珍珠战争主题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 对赛珍珠和平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和平学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的趋势背景下, 本文从和平学与文学交叉的角度出发, 以赛珍珠的战争小说《龙子》为文本, 结合作品中与和平学相关的和平、暴力、冲突、女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反思, 发掘赛珍珠的和平观内涵, 进而探讨《龙子》对和平学研究的阐释, 拓展和平学研究的新思路。

关键词: 和平学; 赛珍珠; 《龙子》

赛珍珠(1892-1973)是一位美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自出生4个月被带传教士的父母带到中国后, 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时间, 其发表的作品大多以中国题材为主。1938年凭借描写中国农民群体的长篇小说《大地》, 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她不仅是第一位因写中国故事而获奖的美国女作家, 可以说也是早期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的文学代表。除了作家这一主要身份外, 赛珍珠还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和平主义者。赛珍珠坚持不懈地将提倡种族平等, 反对文化霸权等和平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她1948年创办的“欢迎之家”, 1964年设立赛珍珠基金会等, 不仅为流离失所的美亚混血儿童带来安定的生活, 也为和平思想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赛珍珠前期的大部分作品, 从她的《大地》三部曲开始, 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了抗日战争这一主题, 而整部小说都以抗日战争为主题, 在赛珍珠的创作中, 《龙子》是最重要的一部。^[1]

《龙子》发表于1942年, 描写了1937年至1941年南京城西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林郅一家, 在日寇占领南京时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奋起反击的故事^[1]。小说不仅再现了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 展示了乡土中国儿女们在战争时期的心路历程与命运经纬, 也集中表达了赛珍珠的和平观。^[1]近年来, 虽然国内外关于赛珍珠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且广泛, 但她的和平观研究却一直没有引起较多关注。和平学(Peace Studies)是二战后兴起的一个全新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为我们理解和解决暴力冲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途径, 并越来越受到学界和社会的关注。^[3]在和平学多元化发展日益明显的趋势背景下, 本文在分析作品的基础上, 从作品中与和平学相关的和平、暴力、冲突、女性等方面进行分析与反思, 进而探讨《龙子》对和平学研究的启示, 找寻和平学研究的跨学科新思路。

1 《龙子》中三种暴力的体现

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挪威著名学者加尔通教授认为, 和平的定义之一即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缺失或减少。^[4]也就是说, 我们要知道和平, 就必须了解暴力, 将暴力研究作为前提是和平研究的一个基本要点。和平学范畴内的暴力概念分为三种, 即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如果将暴力作为问题, 将和平作为解决方法 and 治疗方案, 那么对每一方面都需要我们研究、教育和行动。直接暴力通过复仇和攻击性威慑自我滋生, 直接暴力通常会构建结构暴力, 结构暴力导致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直接暴力, 文化暴力使所有上述暴力合法化。战争作为暴力的最高形式, 代表性强、影响面广、破坏力大, 在《龙子》中将以上三种暴力及其相互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

直接暴力是一种有形的或看得见的暴力, 一般指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暴力冲突以及言辞和心理上的虐待。^[4]《龙子》中的直接暴力主要体现在战争中的杀戮与残害行为。在敌军的铁蹄尚未践踏这片土地之前, 林村的老百姓天真的认为只要以礼相待, 就能幸免遇难。但飞机的轰鸣声震碎了他们的幻想, 血

腥残酷的战争惨状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人像泥土做的一样。这儿一只膀子，那儿一个头，这里一只脚，那儿一条腿，东一挂肠子，西一颗心脏，鲜血遍地流，骨头到处都是。”[5]这些直接暴力摧毁的不但是人的身体，还造成了不计其数家庭的支离破碎。当敌军飞机对城里进行第二次空袭时，林郊和三儿子亲眼目睹了满街的碎砖、瓦块、倒塌的房梁和飞扬的尘土，他们看到人们因失去亲人而嚎啕大哭。随着每一声爆炸，就有一些人死去，大火熊熊燃烧，埋在废墟中人们的惨叫接连不断。见到如此惨不忍睹的景象的林郊心脏在胸膛急速跳动，浑身颤抖。淳朴的乡村百姓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无辜的人会被残忍的杀害。战争时期，因为日军杀的人太多，多的没办法把他们都埋掉，无法掩埋的尸体便被扔进河沟里，长江里。汛期江水涨时，尸首又被倒灌进了河沟，本地的还有上游城市冲下来的死尸一一浮到水面上，留在岸边。江河遍地皆是腐尸把病魔降临到了百姓的头上。这些邪恶的暴力行径将战争中最为黑暗与残暴的一面暴露无遗。日军已不觉得自己是在杀人，他们把刀枪下的哀号当作畜生，当作猎物，毫无杀人时的负疚与战栗。战争把人类的兽性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哭泣、泪水、蹂躏、残垣，成为了这种兽性无时无刻不在的明证。

战争中残忍的杀戮行为无疑给普通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然而其中女性群体因其遭受的性暴力则会比男性更加处于被动的生存处境。在《龙子》中，赛珍珠将作品中的性暴力赋予了明显的政治学含义，强奸成为中国软弱、日本野蛮的标志。赛珍珠在描写敌人的性暴力行为时，并未采取隐晦的手法展现其对中国妇女的迫害，而是直白且真实地向读者剖开血淋淋的真相。林郊的大儿媳兰花，是小说中中国农村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她性情温和含蓄内敛，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家庭与孩子身上。如此单纯的性格与其单调的生活经历导致她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性，在教堂学校避难时，由于厌倦了环境和饮食，她瞒着所有人偷跑了出去。因为对战争的不了解，她毫无戒备地走在街上，被五个许久未见到女性的敌军士兵找准时机拖进公厕。他们轮流在兰花身上发泄着兽欲，当轮到第五个人时，兰花已经断气了，但这个士兵竟然连尸体也没放过。兰花以如此凄惨的姿态结束了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但即使躲在相对安全的教会，当面临直接的武力威胁时，也不得不让一些女性作出“自愿”的牺牲。当敌军进行武力威胁时，为保护更多的手无寸铁的妇女，七名年轻的妓女主动站出来，从避风港凛然踏入不归路。

而敌军的兽行远不止此，不只是年轻的女性会受到性暴力的伤害，凡是具有女性的生理功能甚至女性外貌特征的人，都难逃残暴的敌军之手。吴廉的母亲，一位年事已高，老得连路都走不动的妇女，竟然也在敌人扫荡村庄时被强奸致死。“那些丧尽天良的野蛮人在恼怒之下，像糟蹋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一样，把她给糟蹋了。”[5]性暴力带来的不仅是对女性的身心戕害，还有对人性善良面的摧毁。敌人在扫荡村庄没有发现女性时，竟将林郊长相俊俏的三儿子当成了发泄兽欲的对象。性格一向善良温和的三儿子，因为这场遭遇，逐渐沦为了冷血的杀人机器。敌人的性暴力行为不仅是为了发泄兽欲，更是一种用来达成特定军事政治目的的手段[6]。对女性施加性暴力意在摧毁一个群体的肉身和人格完整性，强暴一个共同体里的女性，可视为是象征地强暴这个共同体的身体。即使受害者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也不可避免地被视作是敌人兽行的证据，是国家失败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性暴力不是无意义的残忍，而是有着战略合理性的文化摧毁行动。

在当时的国际社会，随着战争愈发水深火热，中国的抗战形势引起人道主义者的广泛关注，日本侵略者收敛了杀戮、强奸和肆意破坏这样的直接暴力形式。他们进一步加强了战争社会中的结构暴力来维系与中国民众之间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不平等制度来维系统治阶层的利益和优势[4]。结构暴力是指贫穷、疾病、压制和社会歧视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它关注的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现象。[4]日本侵略者通过结构性暴力不择手段地搜刮百姓，他们派人四处走动，或察看收成，或估算产量，或吩咐庄稼人要按定价出售稻谷，他们把价格定的很低，几乎够不了种田的本钱。他们还制定了不准捕鱼的法规，整个土地上，只有敌人才有权吃鱼。在如此的结构暴力之下，人的重要权利被否认，人的经济得不到满足、社会、政治地位产生了不平等。除此之外，苛捐杂税多似牛毛：土地税，鸦片税，种子税，收成税……苛刻的规定和沉重的税费像一座座沉重的大山，压榨着终日劳碌的农民，让他们不得翻身。但侵略者狡猾地认识到，驯养一个民族的奴性，根本上是要从心智上摧毁他们。于是，鸦片这个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痛苦磨难的恶魔，在敌人的推波助澜下，又卷土重来。无数的中国人沦为鸦片的奴隶，在烟雾缭绕的四方小屋里醉生梦死，浑然忘记他们脚下的土地正处于多么水深火热的境地。正是通过这种结构性暴力，敌人一步步瓦解反抗民众的意志力，企图将这个自由国

土上的子民变成其巩固统治的工具，为上层侵略者提供资源和地位的特权。而侵略者构造的阶层金字塔，却是由中国民众的累累白骨搭建的。

从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与战争下渗至各个细微的意识形态领域，日本侵略者挑起群体之间的纠纷、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资源分配。他们此类惨无人道的粗暴行为导致暴力冲突层层升级。当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残酷性引来越来越多和平主义者的反对时，敌人便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幌子，向被侵略地实行文化入侵。以文化暴力这种深层次的暴力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文化本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而在面对不同的文化冲突时，日军采用了暴力改造的手段，《龙子》中战争后期直接暴力和结构性暴力的减少或控制，是以文化暴力的增长和维持为代价的。日军在此次战争中通过传单报纸等媒介大肆宣扬他们所谋求的是和平，殊不知，这本就是一种暴力的施加形式。日军用“飞船”撒下很多传单，用报纸进行宣传，宣称他们带来的是和平与秩序。在和平学范畴里，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正义战争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但没有人认为，一个国家可以发动战争来“保护”其它国家。他们四处张贴告示，画着他们微笑着把蛋糕和水果递给跪在地上的百姓们，声称自己为给予百姓食物、和平和平安的友好邻邦。而现实却是，敌人拿走了百姓的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饥饿的百姓只能抢夺粘贴告示的面糊来维持生存。在文化暴力的施加下，所有能买到的书尽是敌人写下的满纸谎言，曾经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被祖祖辈辈教导要敬重文字，也都因为日军的谎话，把这些文字烧成了灰烬。日军大肆宣传其战争之正义，从和平学的角度看来，正义战争的唯一理由就是让人们生活在不受伤害的和平之中[9]，而日军的所作所为与所谓的正义性背道而驰，他们的大肆宣传与粉饰太平也愈加反映出其背后犯下的罪恶。也正是通过洗脑式对“东亚新秩序”的宣传，日军美化其暴力行为，为其直接或结构性暴力辩解或使其合法化，企图削弱中国民众的反抗意识，迫使其身份认同。

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在战争中形成了一种递进关系。日本军国主义的直接暴力行为导致了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破坏，进一步削弱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和抵抗能力。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通过文化暴力努力塑造中国人民的认同和价值观，使其接受对他们的统治。这种递进关系让日军侵华的暴力行为得以持续和加剧，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暴力结构不仅给人的身体留下伤痕，也给人的思想和精神留下印记，它是对人性的亵渎，对良知的戕害。战争的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渗透到百姓们所有的生活、制度习俗、文化甚至心理状态之中，使得原本淳朴善良的农民的人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人的善与恶也都暴露无遗。强盗和土匪像莠草一般冒出来，夜晚潜入村里肆意抢夺，在战争的苦难面前，这种古老的罪孽又死灰复燃，往百姓的伤口上撒盐。曾经满脑子都是丰收的美好愿望的百姓们，在亲眼目睹了血淋淋的现实之后，脾性也发生了改变。“在过去自由的日子里，男人女人的脸上，张张都是那么热情、自在、开朗；笑声不断，此起彼伏；人们的声音都是甜润润的，谁也用不着对谁瞒着什么。可如今，村子里一片死寂，整个乡村里，百姓的脸上神情阴沉、冷酷。这是因为他们在鬼子的统治下，日子过得很艰难，而他们刻骨的仇恨又找不着发泄的地方，除非偶而偷偷干掉几个鬼子。”[5]如同瘟疫一般，战争带走了一片土地的生机与活力，只留下了被仇恨驱使的行尸走肉。战争之前，林郊的大儿子是一个头脑简单、心地善良的人。战争初期，他还是迫不得已才杀人，后来他的天性就变了。昔日爱说爱笑的男人变得不苟言笑，杀人轻而易举。而性格文静的三儿子，在经历过敌人的强暴之后，已经把杀人当成自己的欢乐。只要是杀了一个敌人，他总是乐不可支。昔日那个一看到尸体都吓得作呕的人，如今变成了一个因为喜爱杀人而杀人的人。战争就这样以肆无忌惮的暴力摧毁了人的个体生命，践踏了人的价值尊严，颠覆了人类曾经坚定地恪守的正义、和平、公理等价值信条产生了社会中的恐惧、憎恨和猜疑。[2]所以赛珍珠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在《龙子》中着力表现暴力对人性的戕害。但即使是这样充斥着暴力与残忍的战争，满目疮痍的土地仍然能开出和平的小花，这体现在赛珍珠对人物的刻画中，也最终汇合成对和平的独特思考与阐释。

2 《龙子》中不同形象对和平的差异性理解

普遍认为，消除暴力也就意味着和平。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将暴力狭隘地限定在造成人的肉体伤害和痛苦的战争或冲突的直接暴力的层面上。[9]因此，很多人表达的对和平的诉求往往是消除痛苦，减少暴力，小说中的吴廉便是如此。吴廉是一个商人，也是汉奸。虽然他向往和平，认为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但是他认为战争的坏处在于他的生意收到了毁坏，财富遭到了威胁，而他向往和平也是因为“只有在平时时期，

人们才能发家致富，在战争中一切都会失去。”[5]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只求安稳。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抵抗，他就会得到和平，而他的生意也不会受到威胁。他认为，在战争年代，他要想方设法的活下去，“活下去就有和平的希望。”[5]而要想自己活下去，就得从敌人那里得到保护。如此的和平思维致使吴廉在卖国贼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他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觉得自己并非心想做叛徒，“他不过是个生意人，除了他自己，他还得养活一家妻儿老小。”[5]所以不管采取怎样的方式，只要直接暴力不作用于他身上，只要他与侵略者之间不产生冲突，就达到了他期望的和平。

吴廉的看法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和平思维，他认为不抵抗就会结束战争，就会得到和平，却忽视了除去直接暴力在的种种渗透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不和平因素。这样的消极和平，依靠有违和平的手段强制执行的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新的冲突很有可能由于过去的苦难和仇恨，以及不得不对他人惟命是从的羞辱感，再次萌芽。然而，在对战争缺乏了解的百姓身上，不乏吴廉这种消极和平的思维。小说中提到，有些百姓认为只要是太太平平，谁来统治这座城市都是一样的。“他们期待任何形式的和平。”[5]为了寻求短期内的和平，他们可以容忍结构性暴力。长期以来，百姓们注意到了人为暴力或直接暴力，忽视了制度或结构暴力。而和平学范畴内的和平是一种结构，它不仅仅是直接暴力的消失，而且意味着深层性的结构暴力的治理与社会和解。虽然结构暴力在平时可能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稳定状态，但一旦发生质变，就会引起另一次的冲突甚至战争。[9]

在和平学范畴内，没有战争只是一种消极和平。和平学特别关注另一种和平——积极和平的构建。积极意味着消除了饥饿、暴力、践踏人权、难民、环境污染等问题，它意味着创建了一种社会环境，人们可以在其中富裕生活和体面生存[2]。除了真实的反映了战争中一些人的消极和平思维，《龙子》所传达的和平观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也蕴含了和平学中丰富的积极和平思想。积极和平的概念建立在对广泛社会条件的理解之上，公正和平等是和平的根本因素，不消除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不消除结构性暴力，和平就不可能实现。[11]因此，积极和平是一种进程，它关注未来的、持久的、全面的和真正的和平。《龙子》中的积极和平观包含了赛珍珠对于战争后的和平建设的思索以及人性回归的维度。这种超越时代与时空的洞见，主要体现在小说中林郊和玉儿两个人物对于和平与战争的思考。

吴廉在文中可以作为消极和平观的代表人物，而与之相反，林郊的想法行为则传达出积极的和平思想。在对敌人最初的和平期待被现实粉碎后，林郊积极地团结自己以及周围的力量进行抵抗。他始终相信，战争是会结束的，和平是会到来的。所以他并不以杀戮敌人之目的，而是对未来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对林郊来说，战争对百姓人性的扭曲是敌人在他们身上造下的最狠毒的罪孽。在亲眼看到原本单纯善良的大儿子杀人易如反掌，以及三儿子把杀人当成一种乐趣时，林郊思考“等天下太平了，我的儿子还能像往日一样文静吗？”[5]他暗自问自己“我们变得像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好战，难道说这不是我们的末日临头了吗？”[5]这样的思考表明，即使在战争时期，林郊也带着正确的目的诉诸战争，即战争的目的为了达到和平与正义，而不是报复。[9]林郊不仅思考现在，也在思考将来，他依然怀有对于战争后人性回归的呼唤与渴望。他认为即使是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也应该记得和平的珍贵，“年轻人或许记不得，我们就得记得，再教他们懂得：太平是人的最好的食粮。”[5]当看到年轻的学生在战争时期背着书，逃到几千里以外的地方继续学业时，林郊十分高兴，因为他认为这些青年没有人在战争中浪费掉了自己的青春。林郊说，“现在这种时候，知识是没有用的，现在除了运气没有什么东西能救我们，不过这个该死的战争结束后，我们就需要知识了。”[5]虽然林郊战时知识无用论有失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林郊的说法中可以看出，他认为战争的结束并不是和平的开始，真正的和平在战争结束之后仍旧需要构建一种积极的社会环境。因此，《龙子》中所倡导的和平观，既通过种种暴力的描写包含了“防止战争”的纬度，也包含了“建设和平”的维度。而这一趋势，也正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和平学者研究目的从“防止战争”到“建设和平”的转变。[4]

战争在把人置于幸福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创造与毁灭、正义与邪恶、死亡与再生交织在一起的炼狱，在求生的本能和死亡的双重驱使下，人类本质力量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苦难、毁灭、死亡的高昂代价里，凝聚着人类的力量和智慧。[12]作为小说中光辉鲜活的女性形象，林郊的二儿媳玉儿在读书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对和平与战争的看法。当她怀有身孕而战争即将来临时，她伤心地想“活着，生儿育女，享受生活的乐趣，看着新生命的成长，创造更多的新生命，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而要摧毁用生命创造出的这一切是多么愚蠢！”[5]她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和安宁是怎样失去的，失去和平后的人们又是如何相互对待的。

“人们在战争中露出了贪婪的本性，他们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甚至拷打折磨，吃人肉，一旦和平丧失，人们就会干出这种野蛮的、禽兽般的事情来。”[5]不仅如此，玉儿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在思考“如何避免这一切”[5]以及“怎样使我们的孩子免遭这样的劫难”[5]。从林郊和玉儿的思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和平事业不是由少数大人物、由国家机器、由一些大国所垄断的，而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由鲜活生动的男男女女、由普通的公众和社会阶层缔造的，也就是说，和平事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3]

3 《龙子》中冲突的化解

无论是积极和平还是消极和平，最终都统一于和平这一理念。而消极和平作为和平的初级阶段，可以为积极和平的生长提供有利机会，并可能转化为积极和平。[14]加尔通教授对于和平的另一个定义是和平是非暴力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也就是说，和平建立在非暴力和创造性解决冲突的背景之上。因此，我们要实现和平，就必须了解冲突以及如何转化冲突。[15]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化解过程就是消除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过程，强调的是用非暴力方式来处理争执的技巧。[15]冲突远不止是肉眼所见被看作时“麻烦”的直接暴力，它同样也是被凝固为结构的暴力，以及使暴力合法化的文化。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分析及其化解的目的在于冲突的转化而不是冲突的解决。因为冲突的转化不只是解决直接暴力的过程，更是意识到解决深层次文化和结构暴力的必要性，以及改变进程中冲突的不可避免性。

小说中战争冲突的化解的主要途径便是寻求暴力抵抗和人道主义方面的平衡。按照和平学的观点，在暴力的影响下，人类的肉体和精神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正如人不可能消除所有的疾病一样，人类也不可能铲除全部的暴力。[9]但是和平学的观点认为，我们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暴力，使和平与暴力之间达成一种比较好的平衡。在战争初期，当林村百姓们对和平的吁求全然无效，正义的警告根本无用时，拿起武器就成了和平的唯一机会。他们对于敌军的抵抗形式主要是通过暴力抵抗暴力，进行暴力反击，在战争的戕害之下，他们放任心中的仇恨，未进行反思，甚至模糊了家庭与战场的界限。从某种角度来看，林家老大和老三为代表的以暴力抵抗暴力的林村百姓并无过错，他们的个人经历折射并放大了那个历史时期成千上万人的遭遇。人们一方面通过武力扩张而暴露出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智慧创造而暴露出人性。[7]惨烈的战争也折射出理性的光辉，孕育出理性的光芒。因此小说中的战争后期，一种积极的抗争形式出现了，以林郊和玉儿为代表的百姓们学会了在战争中以超越战争的人性视野来进行战争的反思，他们在战争时期仍记得和平之珍贵，并会向下一代传递和平的观念，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他们深知，在恐怖战争发生之后，生命还在继续，这是一个新的关乎生命的机会。生活总会重新开始，邪恶存在于某个时期，可能会一次又一次的再来，但它从未允许是绝对的主宰。它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它总是相对的，我们有能力克服它。这便是《龙子》中达到的和平与暴力、暴力抵抗和人道主义之间的平衡。

在《龙子》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一方面太过渺小和“孤立”而没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又太过普遍和严重而不能被忽略。没有人承认这种压迫是“冲突”或“大规模暴力”，因为它由无数次持续不断的且看上去孤立的行为构成，它太过平常以至于常被忽略。加尔通教授在他的《和平之道-和平与冲突、发展与文明》一书中提到，支撑战争的因素之一是父权制（人类种群中男性性别的统治），而反抗父权制就意味着反抗父权制文化和结构，并在性别间达到一个更公平的权利分配比例。然而《龙子》中一些女性思想以及身份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男女地位冲突化解的一线光亮。在小说中，林嫂因为战争不再固守自己曾经信奉的封建教条，从家庭走向战场，与男性并肩作战，保卫故国家园，并在战争的历练中不断成长。玉儿热爱读书，不甘心在家里生孩子做饭，主动接受革命青年学生的抗日宣传，同丈夫一起奔赴抗日根据地，然后回到家乡敌占区加入消灭日寇的行动中。[2]林郊的小女儿半笑自懂得渴望的滋味起，就盼望着上学，战时她离开家去白人办的学校的上学，通过学习追求自由和人格独立。外交官的女儿梅丽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回国参战。战争将不安于传统性别设定的女性裹挟而下，让她们参与了战争的历史的进程，承担了战争中的责任，暂时挣脱滞重的性别束缚，寻找到女性生命力释放的方式。[2]

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细致刻画，赛珍珠似乎着意突显女性在人性的救赎方面的重要意义。林郊和林家老二在战争暴力下也能彰显人性的光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妻子互敬互爱，而林嫂和玉儿始终以女性的善良与温和影响、改变着林郊与林家老二。[7]《龙子》中这些光辉的女性形象在战争中将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直

面暴力的可怕影响。这些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关键性角色应该得到承认，而且也应该被支持得到自己应有的、正确的位置。女性天生就具有和平性，因为女性最懂得一个生命来之不易，最懂得生命的珍贵。和平既非无视世界被邪恶势力所笼罩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亦非脱离烟漫是而强调政治乌托邦般的现实或天真视角。和平同健康一样，既不会有绝对的和平，也不会有绝对的健康，能够出现的情况是在和平与暴力之间有更好的平衡，多一点和平，有更好的和平，少一点暴力，从而使人类的处境得到改善。

4 结语

《龙子》不仅是对日军罪行的揭露，也是对所有暴力的深刻反思，是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赛珍珠对战后心灵重建的前瞻性思考。[16]在《龙子》，以林郑为首的中国民众没有仅仅用暴力抵抗暴力，而是沉淀了中国人的和平心性，始终向往着无暴力无战争的和平化文化秩序。赛珍珠在《龙子》中做到了在民族与文化中发现寻找，将中国人民的和平追寻汇入了独特见解。和平是人类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共同的梦想。文学是传递和平思想的重要媒介，在战争主题的言说上，人性、和平、启蒙是战争文学的重要母题，以此为内核而构成的和平文化及其思想指向亦是战争文学的价值蕴含与灵魂所在。和平研究的任务不是不切实际地追求善与恶的绝对胜利，而是要更好地处理暴力带来的痛苦，就像对付疾病所带来的痛苦一样。[9]正如《龙子》的研究，不仅是为了发掘赛珍珠的和平观内涵，更是为了借文字的力量传达和平的重要价值，因为人们越是感受到暴力之恶、冲突之烈、战争之危，也就越能体会到安定、和平的可贵。

参考文献

- [1] 郭英剑,郝素玲.一部真实再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扛鼎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龙子》[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54-63. DOI:10.13317/j.cnki.jdxkb.2005.03.011.
- [2] 徐清.赛珍珠《龙子》中的乡土中国[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3):78-85.
- [3] “和平学研究的新进展”笔谈[J].史学月刊,2016,(07):5.
- [4] 刘成.和平学的核心内涵[C]//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察哈尔学会,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战争、冲突与非暴力化解”学术研讨会发言材料汇编.察哈尔学会;南京大学历史系,2014:3. DOI:10.26914/c.cnkihy.2014.000339.
- [5] 赛珍珠:《龙子》,丁国华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年
- [6] 韩冷.战争与强暴的同构[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03):55-57.
- [7] 王丽霞.《龙子》:赛珍珠对战争暴力的反思[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11):9-11+20.
- [8] 刘成.化解冲突和谐共存——和平学研究简介[J].怀化学院学报,2016,35(03):2. DOI:10.16074/j.cnki.cn43-1394/z.2016.03.001.
- [9] 刘成.和平研究视角下的和平与战争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32-140. DOI:10.3969/j.issn.0257-0289.2008.04.019.
- [10] 刘成.转化而不是解决: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化解[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42(6):16-25. DOI:10.3969/j.issn.1007-7278.2005.06.002.
- [11] 于明波.“冲突与和平框架”[C]//察哈尔学会.2011-2018年察哈尔圆桌论坛资料合集.[出版者不详],2019:7. DOI:10.26914/c.cnkihy.2019.045288.
- [12] 逢仁霞.战争中的女性与女性眼中的战争[D].曲阜师范大学,2007.
- [13] 王逸舟.曲高不惧和者寡——评李英桃教授新著《女性主义和平学》[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29(06):155-156. DOI:10.13569/j.cnki.far.2012.06.005.
- [14] 叶晓红.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加尔通的和平思想评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4(05):146-152.
- [15] 刘成.和平学与全球化时代的和平建设[J].南京社会科学,2015(03):140-146.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3.021.
- [16] 孙宗广.人道主义旗帜下的民族主义走向——论赛珍珠《龙子》的战争视角[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02):39-43. DOI:10.13317/j.cnki.jdxkb.2012.02.003.

[17] Galtung , Johan .“Violence , Peace , and Peace Research .” [J] .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1969 (3) : 167 — 191

[18] Galtung , Johan .“ Cultural Violence .” [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 Vol .27 , No .3 , 1990 : 291 — 305